

钱穆先生著作系列

中国历史研究法

「新校本」

钱穆
穆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钱穆先生著作系列

中国历史研究法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历史研究法 / 钱穆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7-5108-1470-9

I. ①中… II. ①钱…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方法
IV. ①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82235号

中国历史研究法

作 者 钱穆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 jiuzhoupress. com](http://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 com](mailto: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6.75
字 数 134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470-9
定 价 13.5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國歷史研究
錢穆

钱穆先生手迹

寒岩綠碧澗濯足認清幽却
拂千巖石聊乘萬里泳氣快
隨脫屣步武欲橫秋極目滄
江晚煙波殊未休

朱子詩句
錢穆

錢穆先生書法

新校本说明

钱穆先生著作简体新校本，经钱胡美琦女士授权出版，以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所编《钱宾四先生全集》繁体版为本，进行重排新校，订正其中体例、格式、标号、文字等方面存在的疏误，内容保持《全集》版本原貌。

《中国历史研究法》根据钱穆先生的八次演讲词整理润饰而成，1961年、1969年分别在香港和台湾出版。1987年，先生对此书又加增润，并附入《略论治史方法》《历史教育几点流行的误解》两文于后。附录中的其他六篇文章，系先生早年所作，因与本书作意相近，编辑《全集》时将其收录其中。

九州出版社

序

近人治学，都知注重材料与方法。但做学问，当知先应有一番意义。意义不同，则所采用之材料与其运用材料之方法，亦将随而不同。即如历史，材料无穷，若使治史者没有先决定一番意义，专一注重在方法上，专用一套方法来驾驭此无穷之材料，将使历史研究漫无止境，而亦更无意义可言。黄茅白苇，一望皆是，虽是材料不同，而实使人不免有陈陈相因之感。

此书乃汇集八次讲演而成。在一九六一年，香港孟氏教育基金会，邀我去作讲演。“历史研究法”之大总题，乃由此一机构所决定。我则在此讲题下，先决定一研究历史之意义，然后再从此一意义来讲研究方法。故我此书，实可另赋一名曰“中国历史文化大义”。研究历史，所最应注意者，乃为在此历史背后所蕴藏而完成之文化。“历史”乃其外表，“文化”则是其内容。

本此主要意义而分本讲演为八题。最先是讲“如何研究通

史”，最后是讲“如何研究文化史”。其实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则最好应以文化为其主要之内容。其间更分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之六分题；每一分题，各有其主要内容，而以文化为其共通对象与共通骨干。每一分题，在其共通对象文化大体系之下，各自地位不同，分量不同，其所应着重之材料与其研究方法亦随而不同。读者勿忘我此八讲演之主要意义所在，自将可见我此所讲，语语有本源来处，亦语语有归宿去处。

此一讲演集，先由我一学生叶龙君记录讲辞，再由我整理润饰。一九六一年底，曾在香港出版。惟初版后未再付印。此版乃是在台之第一版，内容一如初版，只在不关紧要之文字上稍有些少之改动。因初版并未有序，此版特为增入，以稔读者。

一九六九年四月钱穆自识于台北外双溪之素书楼

附识

此书多年绝版，今整理重印，略有增润。并附录早年两文《略论治史方法》、《历史教育几点流行的误解》于后。

一九八七年双十节钱穆自识于台北士林外双溪之素书楼时年九十有三

目录

序 / 1

- 一 如何研究通史 / 1
- 二 如何研究政治史 / 16
- 三 如何研究社会史 / 34
- 四 如何研究经济史 / 52
- 五 如何研究学术史 / 69
- 六 如何研究历史人物 / 85
- 七 如何研究历史地理 / 106
- 八 如何研究文化史 / 122

附录

- 略论治史方法 / 137
- 如何研究中国史 / 146

历史与教育 / 155

历史教育几点流行的误解 / 164

中国今日所需的新史学与新史学家 / 172

中国历史教学 / 183

历史教学与心智修养 / 190

中国史学之特点 / 194

一 如何研究通史

本书总讲题是“如何研究中国史”。这是第一讲，讲题“如何研究中国通史”。但讲这一题目，容易流于空泛肤浅。请诸位原谅。

让我首先问为何要研究中国史？简单回答：“中国人当知道中国史。”这是一项极普通极基本的道理，我们应当承认。昨天报载美国前总统杜鲁门发表谈话，主张美国青年应多知道些美国史。同样，每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应该知道些关于他们自己本国的历史。中国人应该知道些中国史。中国史讲的中国人之本原和来历，我们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中国人，知道中国人之真实性与可能性，特异性与优良性。我们也可说，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我们各自的自己。譬如我们认识一位朋友，总不能单在他的高矮肥瘦上去认识，当然该知道一些他以往的历史，如他的姓名、籍贯、学历、性情、才干等，我们才算是

知道认识了此朋友。我们是中国人，只有在中国史里来认识我们自己。不仅要认识我们的已往，并要认识我们的将来。若非研究历史，即无从得此认识。

二

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与“传统性”。

研究历史首先要注意的便是其“特殊性”。我们以往的传统，与其他民族有变有异，有自己的特殊性。没有特殊性，就不成为历史。如果世界上一切国家民族，都没有其相互间的个别特殊性，只是混同一色；那就只需要，亦只可能，有一部人类史或世界史便概括尽了。更不须，也不能，再有各国国别史之分。

其次，历史必然有其“变异性”。历史常在变动中进展。没有变，不成为历史。我们读小说，常见说：“有事话长，无事话短。”所谓有事即是有变，无变就不见有事。年年月月，大家都是千篇一律过日子，没有什么变动，此等日常人生便写不进历史。历史之必具变异性，正如其必具特殊性。我们再把此二者，即“特殊性”和“变异性”加在一起，就成为历史之“传统性”。我们研究历史，首先就当知道历史的三种特性。

现在再讲中国史和西洋史有何不同。

据我个人意见，至少西洋史是可分割的，可以把历史上每一时期划断。如希腊史和罗马史，两者间就显可划分。以下是他们的中古时期，这又是一个全新的时期，与以前不同。此下

则是他们的近代史，现代国家兴起，又是另一段落了。如此划分开来，各有起讫。而中国史则是先后相承不可分割的，五千年一贯下来，永远是一部中国史，通体是一部中国史。战国以后有秦汉，决不能和西方之希腊以后有罗马相比。这显然见得双方历史互有不同。此即是我上面所指述的历史之“特殊性”。但此处当注意者，我们只可说，西洋史可分割，中国史不可分割；却不能说中国历史没有“变异性”。我们只能说，西方历史的变动比较显而在外，使人易见；中国历史的变动，却隐而在内，使人不易觉察。我常说，西洋历史如一本剧；中国历史像一首诗。诗之衔接，一句句地连续下去，中间并非没有变，但一首诗总是浑涵一气，和戏剧有不同。

三

诸位研究历史，首当注意“变”。其实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简言之，这一时期的历史和前一时期不同，其前后之相异处即是变。因此乃有所谓“历史时代”。历史时代之划分，即划分在其变上。如果没有变，便无时代可分。我们当知，并非先有了各个时代，才有这各个时代的历史。乃是先有了这一段历史，才照此历史来划分为各时代。时代只是历史的影子，乃由历史中照映出时代。无时代之变，便无历史可写。如在先史以前，人类存在，已不知其经过了几十万年。但其间变动少，便亦无许多时代可分，亦无详细历史可写。于是便成

为我们对这一段历史之所知少。实因这一段历史自身之变动少，人类进步迟缓，故无事变可言、时代可分。浅言作譬，如一人，只是生老病死，只是温饱度日。在其人生过程中，无特殊性，无变异性，其人之一生，便亦无历史可言。

西洋史总分“上古”“中古”和“近代”三时期。上古史指的是希腊和罗马时期，中古史指的是封建时期，近代史指的是现代国家兴起以后。但中国人讲历史常据朝代分，称之为“断代史”。如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宋辽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等。因此有人说中国史只是一部“帝王家谱”，乃把王朝兴亡来划分时代。李家做了皇帝就名唐史，朱家做了皇帝就称明史。此说实甚不然。一个统一王朝之兴起，其政府规模可以维持数百年之久，在这一时期中变动比较少；突然这一王朝崩溃了，另一新王朝起而代之，当然在这两朝代之间历史会起大变动；所以把断代史来划分时期，就中国历史言，可以说是一种自然划分，并无很大不妥当处。

若我们必要比照西洋史分法，则中国的“上古史”当断在战国末年。秦以下，郡县政治大一统局面开始，便该是中国的“中古史”了。但这与西方的中古时期不同。大体说来，西方中古时期是一段黑暗时期，而中国汉、唐时代，政治社会各方面甚多进步。不仅不比我们的上古史逊色，又且有许多处驾而上之。我们也可将秦代起至清末止，二千年来一气相承，称之为中国历史之中古期，不当在中间再加划分。若定要划分，亦可分做两期。五代以前为一期。我们不妨称五代以前为中国的“中

古史”。这一段历史，因离我们比较远，由我们现代人读来，有许多事情也比较地难了解、难明白。宋以下的历史，和我们时代相接近，读来较易了解、易明白。我们也可说，中国的“近代史”，自宋代即开始了。

如此说来，可以说中国史常比西方史走先了一步。秦代已是中国的中古时期，宋代已是中国的近代时期了。如此便发生了一问题，即中国史为何似比西方历史先进？这是否可称为中国历史之早熟？但现代史上的中国，却比西方落后，其原因又何在呢？历史本不是齐轨并进的，把一部中国史比起西方史来，何以忽然在前，又忽焉在后？近代西方何以如此突飞猛进，近代中国何以如此滞迟不前？这里面便见出有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与解答。

四

其次，我们研究历史之变，亦宜分辨其所变之“大”与“小”。例如从春秋到战国是一变，但这尚是小变；从战国到秦却是一大变。自东汉到三国魏晋时代却又为一大变。历史进程，一步步地不断在变。从此不断之变中，我们又该默察其究竟变向哪里去。正如一个人走路，我们可以察看他的行踪和路线，来推测他想走向哪里去。同样情形，治史者亦可从历史进程时期之变动中，来寻求历史之大趋势和大动向。固然在历史进程中，也不断有顿挫与曲折，甚至于逆转与倒退；但此等大多由

外部原因迫成。在此种顿挫、曲折、逆转与倒退之中，依然仍有其大趋势与大动向可见。此等长期历史之大趋势与大动向，却正表现出每一民族之“历史个性”有不同。我们学历史，正要根据历史来找出其动向，看它在何处变，变向何处去？要寻出历史趋势中之内在向往，内在要求。我们要能把握到此历史个性，才算知道了历史，才能来指导历史，使其更前进。使其前进到更合理想的道路上，向更合理想的境界去。

今试粗略言之。中国史的趋势，似乎总向“团结”“融和”的方向走。虽然其间也有如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以及如今天般的分裂时代；但中国历史的大趋向，则总是向往于团结与融和。西方史则总像易趋于“分裂”与“斗争”。中国史上有造反与作乱，但和西方史上所谓革命不同。中国史上也有向外扩展，但与西洋史上之帝国征服又不同。此项所谓历史的大趋势大动向，我们无法在短时期中看清楚。但经历了历史上的长时期演变，自能见出所谓各自的“历史个性”，亦可说即是在历史背后之“国民性”或“民族性”之表现。刚才已说过，中国史即是中国人之来历与其真实性之表现，西洋史亦即是西洋人之来历与其真实性之表现。因此，历史个性不同，亦即是其“民族精神”之不同，也可说是“文化传统”的不同。一个民族及其文化之有无前途？其前途何在？都可从此处即历史往迹去看。这是研究历史之大意义大价值所在。

我们该自历史演变中，寻出其动向与趋势，就可看出历史传统。我此所谓“历史传统”，乃指其在历史演进中有其内在的

一番精神，一股力量。亦可说是各自历史之生命，或说是各自历史的个性。这一股力量与个性，亦可谓他们的“历史精神”。能使历史在无形中，在不知不觉中，各循其自己的路线而前进。若那些在历史进程中沉淀下来的，或僵化而变成的一些渣滓，此乃依随着历史生命而俱来的一种历史病，却不当误看为历史传统。

五

现在我们再重述前面所讲的意义。如何研究历史？贵能“从异求变”，“从变见性”。从外到内，期有深入的了解。我们研究历史，其入手处也可有三种途径：

第一种：由上而下，自古到今，循着时代先后来作通体的研究。

治史必有一起点，然后由此以达彼。此起点，即是从入之途。我们研究历史要先有一知识据点，然后再由此据点推寻到其他另一点。例如这讲台上茶杯，我知道它是茶杯，同时即知道旁的东西非茶杯。我虽未知此许多东西是何物，但起码已知道了它决不是一茶杯。如我们读《左传》，先明白了春秋时代是怎么一回事，待我们读到战国史时，便见战国与春秋有不同。此即所谓“从异明变”。普通自该从古到今，从先而后地顺次读下。但现代人似乎觉得这样学历史太麻烦了，真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之感。也有人以为古代史已是年